

·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

抗战时期

的

KANGZHAN SHIQI DE DUIWAI GUANXI

对外关系

下

唐培吉 主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

抗战时期 的对外关系

唐培吉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唐培吉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5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ISBN 978 - 7 - 5402 - 0941 - 4

I. 抗…

II. 唐…

III. 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1937 ~ 1945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4329 号

责任编辑: 梁 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70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28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上下) 89.80 元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章 南京政府对日妥协退让和依赖国联抑日侵华的外交

(1931.9—1935)	(1)
一、日本的侵华政策与“九·一八”事变	(1)
二、南京政府对日妥协退让与不抵抗政策	(4)
三、南京政府避免与日直接交涉和单纯依赖 国联的外交	(8)
四、“一·二八”事变与南京政府争取列强干预 及《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24)
五、李顿调查团的调查和报告及南京政府的反应	(34)
六、南京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与中苏邦交的恢复	(45)
七、日军进犯华北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49)
八、南京政府屈辱求和与《塘沽协定》 的签订	(53)
九、“善后会谈”与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	(58)
十、南京政府争取“国际合作”与日本的 《天羽声明》	(64)
十一、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	(67)

第二章 华北事变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的初步形成

(1935—1937.7)	(70)
一、察东事件与中日交涉	(70)
二、《新生周刊》事件和国民政府的退让	(73)
三、日军在华北寻衅与《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的签订	(75)
四、东京会谈与国民政府改善中日关系幻想的破产	(82)
五、日军策动“华北自治”与“广田三原则” 的提出	(86)
六、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渐趋强硬和张群——川越 会谈	(91)
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 的初步确立	(96)
八、国民政府继续谋求英、美、法、苏等国 援助，准备抗战	(99)
九、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及中德关系	(102)
十、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106)

第三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国民政府

边抗战边谋和的外交 (1937.7—1938.10)	(116)
一、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谋求就地解决的 和平幻想	(116)
二、“八·一三”事变与国民政府的自卫 抗战声明	(124)
三、国民政府诉诸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	(125)
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33)

五、陶德曼调停与蒋介石以战谋和外交的失败	(138)
六、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中日 断交	(143)
七、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外交纲领	(146)
八、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再次谋求国际制裁 和争取英美援助的努力与失败	(148)
九、蒋介石、汪精卫直接与日本的秘密议和活动	(152)
十、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外交政策 和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主张	(158)

第四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积极“苦撑

待变”争取外援的外交(1938.11—1941.12)	(165)
一、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政策的确定	(165)
二、日本内阁侵华谋略的调整	(167)
三、汪精卫集团响应“近卫声明”叛国投敌	(170)
四、国民政府继续争取外援和英国助日抑华政策	(178)
五、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和美国对中日的 平衡政策	(186)
六、蒋介石对日本的两面性政策	(194)
七、美国推行援华制日政策和中美合作的加强	(201)
八、苏德战争爆发前后的中苏关系	(206)
九、中国共产党反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和 日本的反共诱降	(211)
十、中国共产党对英美政策的演变	(212)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依赖盟国抗战

与改善国际地位的外交 (1941.12—1943) (217)

一、珍珠港事变后国民政府谋求与盟国联合

对日作战及中国战区的成立 (217)

二、蒋介石争取美援与美国援蒋促战的政策 (223)

三、国民政府力促苏联对日宣战的失败与中

苏关系的倒退 (229)

四、蒋介石访问印度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 (235)

五、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及美英在华不平等

条约的废除 (242)

六、中美英苏签署《关于普遍安全宣言》及

创建联合国的倡议 (248)

七、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及“开罗宣言”的发表 (251)

八、珍珠港事件后中共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的外交政策 (256)

九、中共积极开展对美、英、苏等国的外交，

击退国民党新的反共阴谋 (258)

十、中共对中美、中英新约的评析 (264)

第六章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反共优先、谋求独占

抗战胜利果实的外交 (1941—1945) (266)

一、国民政府“防共先于抗日”的方针与

中美矛盾 (266)

二、史迪威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276)

三、赫尔利使华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与

美蒋合作压共 (287)

四、国民政府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和苏联对 华政策的变化	(397)
五、雅尔塔会议与《雅尔塔协定》	(302)
六、中苏谈判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309)
七、日本投降前后国民政府拉拢美、苏，力 谋垄断受降权	(319)
八、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和中共中央关于 外交工作的指示	(323)
九、美国调解国共关系和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	(330)
十、中共反对美蒋勾结、垄断受降权的斗争	(334)
后 记	(337)

第四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 积极“苦撑待变”争取外援的外交

(1938.11—1941.12)

一、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政策的确定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政外交方针有了一定的变化。由于日本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军委会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将国民党军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在敌人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①针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②会后陆续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在对外政策上，从原来依靠国际联盟和世界大国来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转变为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争取美、英、苏的援助，以维持抗战。这种外交政策的基点可概括为“苦撑待变”，乃是从抗战开始到相持阶段到来的外交政策教训中得出的一个痛苦的结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幻想“一方面吁请国际联盟及各友好国家考虑采取共同制裁日本侵略暴行之具体行动；一方面积极争取各友邦之援助与合作。”从而调停中日战争。但是，历史事实表明，除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积极援助，国际联盟、九国公约会议以及世界各大国既没有采取措施制裁日本，亦没有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甚至有的国家还按照日本的条件来劝说中国。中国政府通过各方面的外交接触，深深感到当时英、美、法等国各自从本国利益出发，不

^① 《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8年11月25日），《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国防研究院编印，第1058页。

^②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仅不可能对日本采取各种制裁，而且采取绥靖政策来稳住以至讨好日本，以便他们专顾于欧洲的险恶形势。然而，这些大国又希望中国抗战，以维护他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权益。早在1937年10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与胡适博士去白宫晋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就很关心战争，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①11月10日，英国外相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他对中国上下团结一致，前方士气坚决，情形比较战争开始的时候更好，非常欣慰。是月12日，日本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美国代表戴维斯即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深盼中国能继续撑持抗战。”^②1938年1月，王正廷将谒见罗斯福商谈关于在美采办军需等问题向政府报告：罗斯福“在言词之间，似望我方稍加忍耐，继续抵抗。”这些言论促使蒋介石在一次会议讲到外交上务必充分利用列强与日本间之矛盾时就说：“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战抗之决心。”^③

明确提出“苦撑待变”的外交方针是后来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国民政府为加强对美联络，决定请在美国有很好声誉的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乃不断发电敦促胡适上任。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留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后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的主张，为蒋介石所赏识。1938年，赴欧美旅游考察，根据当时各国形势，于7月30日给傅斯年信中，首次提到“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④胡适上任后，于10月20日致电蒋介石，认为美国以实力主持强制的公平和平的机会，今日尚非其时。美苏两国都不愿中国讲和，故俄以武器运往中国；美国不愿中国溃败，故愿经济援助。就当时国际环境看，中国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⑤

①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湾出版，第362—363页。（以下简称《丛编》）

②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湾出版，第396—400页。（以下简称《丛编》）

③ 张其勋：《国民党党史概要》第三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第1143页。

④ 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简编》，第55页。

⑤ 《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178页。

胡适、陈光甫等在争取美国经济援助的艰苦交涉中，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如不能继续坚持抗战，美英等国是不会给予实际援助的。当广州迅速沦陷后，“国外感想甚恶”；而武汉会战的形势更使外国疑虑中国政府能否继续抵抗。其时，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已谈妥了一笔贷款，向罗斯福请示批准，罗斯福沉默片刻之后讲了一段值得深思的话：“如吾人今日允准此事，明日或后日忽有临时政府出现，将使余甚困窘。余认为最好等待数日或一星期，视蒋委员长发表如何谈话，如彼解释广州与汉口之撤退为战略目的，并准备重建其队伍以继续作战，并使世人相信其当前政府形式能于中国内地继续支持，余将甚乐于立即批准此一借款。”^① 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演讲，公开明确地提出了“苦撑待变”的主张，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正如蒋介石于1939年8月25日的讲话中提到：“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吾人惟有紧握机纽”；^② 由此可见，“苦撑待变”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大国的对德日作战之上。

二、日本内阁侵华谋略的调整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三次近卫声明（根据史实，1937年7月11日《派兵华北的声明》是近卫第一次声明，1938年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其第二次声明，依次顺推，则1938年11月3日《转变策略的声明》应是其第三次声明——作者），声明提出“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明确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③ 一改它上一次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这表明日本政府在检讨其对华侵略政策之后，重新修订了它的侵华谋略。

① 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2—134页。

② 张其昀：《国民党党史概要》第三册，第1143页。

③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1840—1945），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401页。

还在武汉战役进行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就担心：“如果我们只是被无益地拖到内地去，那么对日本非常不利，如果再看看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已经出现了非常的反战思想，这样将渐渐陷入困难状态。”^①日本大本营作了这样的论断：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重新开设补给线路继续实行坚强之抗战，以图挽回颓势。如仍寻求中国军之弱点再进行进击，或局部夺取战略要点，则不但不能打击中国军且劳而无功，徒被其吸引兵力而已，故目下仅依进攻作战绝难解决事变。今后应重视战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大本营陆军部于6月17日制定第二期谋略计划，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的决定》，这个计划和决定的要点是：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见，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具体实施办法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建立强有力政权的趋势（代号为“鸟工作”）。

- （1）加强临时政权、维新政权及其他蒋政权的合并（鸠工作）；
- （2）在蒋政权内部及民众中掀起反蒋运动（鹰工作）；
- （3）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及政客（鹭工作）；
- （4）酿成在蒋政权内部反共和平的空气（鸞工作）；
- （5）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鸞工作）。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代号“兽工作”），具体谋略对象：

- （1）宋哲元军（狐工作）；
- （2）阎锡山军（狸工作）；
- （3）旧韩复榘军（栗鼠工作）；
- （4）旧东北军（狗工作）；
- （5）刘建绪军（鹿工作）；
- （6）石友三军（猫工作）；
- （7）徐源泉军（牛工作）；

^① 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与政局》下卷，东京，1952年版，第103页。

(8) 其他武装团体（免工作）。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具体实施方案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山工作），分二期进行：

第一期

(1) 西南系军队回避参加抗日战争；

(2) 通电反蒋、反共。

第二期

(1) 以反蒋、反共、反战为宗旨，建立地方政府；

(2) 对内进行和平通电和实行亲日政策；

(3) 西南大联合。

(四) 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 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海外的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六) 为了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宣传。^①

7月2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设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陆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代表野村后改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代表坂西利八郎中将为主要成员，“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

11月3日，近卫的《转变策略的声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表的。同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它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为此，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的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关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卫、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均作了详细的规定事项。^② 这为后来近卫的第四次声明定下了基调。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精神，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第389—390页。

②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第405页。

《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其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防止急躁。因此，目前最主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并相应地推行其他各种政策。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①按照这个方针，规定对华工作要点是：一、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区划分为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实即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进攻，而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二、亲日政权的扶植，特别是有关亲日政权的统一，其主要目标是使之逐步稳健地发展……三、对中国经济暂时采取应急政策，主要力图恢复与总动员、充实部队急需物资和治安等相关联的局部地区的人民生活，并同时改善交通。^②同月，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由内阁首相任总裁，日本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任副总裁，可见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它的任务是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它在中国的北平、张家口、青岛、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等设立分支机构，以贯彻实施其侵华政策，各地汉奸政权要受日本军司令部和兴亚院联络部的双重监督。

日本军部和政府这一系列的决定、声明、计划、机构等等，充分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侵华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其基本点即对国民党政府由原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面在其占领区，一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进行军事进攻，妄图消灭之，一面建立伪政权，以加强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

三、汪精卫集团响应“近卫声明”叛国投敌

日本在实行政治谋略之初，“对华特别委员会”头子土肥原曾企图将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拉出来组建伪中央政权。土肥原贤二，1891年出身于日本低级军官家庭，1904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1912年毕

① 日本：《现代史资料》（9），1964年版，第553页。

② 日本：《现代史资料》（9），1964年版，第553—554页。

业于陆军大学，即任参谋本部部附，被派往北京从事特务工作。1931年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与关东军合作，积极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策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伪满洲国。随后，又参预筹划华北一系列事变，“七·七”事变后，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积极指挥侵华战争。1938年6月，调回参谋本部，7月任“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

土肥原策动唐绍仪等，是有其情报依据的。唐绍仪，1860年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曾任清廷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等职。1912年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并加入同盟会，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愤而辞职。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被推为七总裁之一。193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因与蒋介石关系不佳，乃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他与土肥原等有往来，表示亲日。1938年9月下旬，土肥原密访了唐绍仪，在土的诱惑下，唐竟跃跃欲试，准备出场，“收拾时局”。为此，唐积极作了投降准备，他拟定了《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永久和平之方案》，表示：“中日必须永久亲善”，“应早谋停战”，“遏止排外思想及行动”，实行“经济合作”，“联合中日实力以抵御外患”。他提出以“唐绍仪氏为中心”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的基本国策是“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对于友邦（指日本）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他对于这个伪政府的首都、国旗、组织系统、国防常备军、财政经济政策、反蒋计划以及准备登台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等等，均作了明确的详细的规定。当土肥原与唐绍仪正在秘密勾结、策划筹建伪中央政权时，被国民党所侦悉，乃派军统特务装成古董商，到唐绍仪家中用利斧将唐劈死。

唐绍仪被杀，使土肥原的谋略计划落空，乃不得不离沪北上，着手做吴佩孚和靳云鹏的工作。靳虽然表示极愿与土肥原商谈，怎奈日本当局看不中他，认为他的地位与声望远不如吴佩孚。于是，土肥原把工作重点放在吴佩孚身上。吴佩孚，生于1874年，清末秀才，后投笔从戎任新军管带，为曹锟得力干将。辛亥革命后因讨伐护国军有功，得袁世凯赏识晋升为陆军中将，后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中直系头目。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吴的主力被打垮，乃退居北平。然其“野心”未死，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家中设“正一堂”，以神道论教为名，联络旧部，窥测时机，谋

图东山再起。土肥原正是掌握了吴佩孚的“雄心”，乃与之勾结。然而，吴佩孚提出的要求过高，特别是吴要招兵买马大建军队，还要日本从中国撤兵等，作为他出山的条件，这是日本绝不会答应的，因此，对吴佩孚的工作进展迟缓，土肥原亦认为：“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1939年12月，吴佩孚因牙病由日本医生开刀，当天暴死。

在土肥原对唐绍仪、吴佩孚的谋略遭到失败之际，影佐祯昭策划的对汪精卫集团的工作则进展得相当顺利。

如上章所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指派下，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科长董道宁同日本内阁的“不扩大派”的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还有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等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1938年5月，新上任的外相宇垣一诚作出姿态，表示愿同国民政府进行接触，蒋介石因种种考虑不再派高宗武而委托孔祥熙派乔辅三与宇垣代表进行秘密会谈后，亲日派周佛海竟怂恿高宗武私去日本活动，实质为汪精卫集团开辟向日谋和的另一个渠道。

1938年6月14日，高宗武到香港九龙广东酒家与西义显会见，双方订立了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其主要内容：

1. 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仲介和平，计划与第三势力之结合。
2. 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
3. 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这种条件为和平之前提，并为使和平仲介能以成立之条件。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确立进步的指导势力，使此势力确保上述条件之实现。^①

这里所指的“第三势力”即汪精卫为首的“亲日主和派”，而所谓“进步的指导势力”乃影佐祯昭为代表的“不扩大派”。这是中日两股势力首次签订的书而协定，表明他们决心联合起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6月17日，松本重治从东京抵香港与高宗武再次会谈。两人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军。高宗武得意地大讲其设想：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

^①（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史》，第188页。

汪精卫立即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地方军阀、实力派，如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广东、四川等地将领，从“各方面响应”。这样，就可使“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必定成功。松本听了亦很动心，积极希望高宗武亲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设想。高宗武乃决定背着蒋介石，暗中前往日本。在赴日本之夜，高宗武曾发生动摇，他感到这个秘密使命的前途和自己个人的命运有点茫然，他觉得自己被夹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心情非常苦恼，他对松本重治透露过这种思想，深怕使命完不成，反落个汉奸罪名，将会遭到蒋介石的处置。松本加以鼓动和劝说：伊藤已等在船上，西义显与影佐先生亦作了各种准备，你是应该去的。“日本方面约定绝对不把你们作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不都是可以中途停止吗？你与蒋先生的问题，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去绝对不会成为你的失败。我可以绝对保证。你应该做非你不可的事情。”^① 在高宗武精神振作起来后，松本经过周密的布置，亲自带高宗武登上日本的“皇后号”轮船。7月5日，“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引导下，高宗武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在同这些核心人物交谈后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即日本方面对蒋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国联和欧美的两面政策十分恼火，均表示出不愿同蒋介石谈判，强烈要把蒋介石赶下台，而寄希望于汪精卫。高宗武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面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②

于是，高宗武要求由近卫首相亲自写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自己是首相，不宜亲自出马，乃要陆相板垣写一封信表明此意，托高宗武带回。7月9日，高宗武回国，因不经蒋介石同意私去日本，不敢回武汉，托人到武汉将报告稿送给周佛海。周佛海接

①（日本）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册，第298—300页。

②（日）影佐祯昭：《漫谈》。